

日本中華總商會關西分會設立祝賀會

# Contents

## 目录

### 日本中華總商會 2013

### 要览 INTRODUCTION

- P3 卷首寄语
- P5 编辑絮语
- P6 会刊目录
- P8 商会概要
- P10 华商信息
- P11 数字经济
- P12 年度纪要

### 年度 REVIEW

- P14 会员总会
- P15 新春交流
- P16 北京联谊会
- P17 关西分会
- P18 常州招商会
- P19 南通开发区
- P20 夏日中国行
- P21 侨乡福建行
- P21 中日经济论坛
- P24 东京中国文化节
- P26 中日友好杯高尔夫
- P27 “华商杯”高尔夫
- P28 丝路画廊红酒夜

### 人物 PEOPLE

- P30 王秀德：行业龙头源清田
- P34 刘炳义：独领风骚太比雅
- P35 邓明辉：大都商会重环保
- P36 翁永飙：金山软件开拓路
- P38 张 喆：社会文化功劳奖

### 专论 OPINION

- P40 关志雄：透析中国贸易结构
- P42 柯 隆：中国经济展新气象
- P44 刘 迪：解读瑞穗资本主义
- P46 朱 炎：详解中日经济关系

主 办：日本中华总商会  
策 划：日本中华总商会宣传部  
发行人：严 浩  
总策划：夏慧昌

主 编：杨文凯  
统 筹：朴文杰  
执 行：孙 辉  
编 辑：孙 辉、张 石、杜海玲  
制 作：程 洁、范晓光  
设 计：邹 鹏  
校 对：沈永康  
协 调：孔 怡

日语顾问：立道 肇

日本中华总商会事務局  
〒100-0006

東京都千代田区有楽町 1-7-1

有楽町電気大厦 南館 1058

TEL : 03-5220-1051

FAX : 03-5220-1052

E-mail: info@cccj.jp

URL: <http://www.cccj.jp>

## 神州 CHINA

- P50 习近平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 P52 瓶颈：雾霾中国与环境治理
- P53 无锡尚德破产象征行业冬天
- P54 十年轮回：从非典到禽流感

## 日本 REPORT

- P56 人口：首次进入净减时代
- P57 观光：目标吸引3000万人
- P58 教育：日本大学亚洲前列
- P59 养老：65岁拿年金成现实
- P60 汽车：混合动力绝地反攻
- P61 电子：沉沦数字革命时代
- P62 申奥：东京展现日本诉求

## 市场 MARKETING

- P64 汇率：日本渴望日元贬值
- P65 股市：日经指数坐地起势
- P66 贸易：贸易逆差创新纪录
- P67 投资：对华投资逆势增长
- P68 合作：TPP左右开国命运

## 商业 BUSINESS

- P70 涉泽荣一与日本式经营
- P71 近江商人与三方好合
- P73 阿吽呼吸与集团式默契
- P74 小涌园的中日交流故事

## 景观 LANDSCAPE

- P76 邮轮旅行：时光优雅而奢华
- P78 东京车站：百年红楼现风华
- P79 飞弹高山：徜徉在静谧古城
- P80 豪斯登堡：异域风情荷兰村

## 趋势 TREND

- P82 衣：TOKYO RUNWAY 万紫千红
- P84 食：米其林超赞东京餐饮业
- P86 住：东京湾高层塔楼的盛衰
- P87 行：日本尖端磁悬浮的明天

## 日文版 JAPANESE

- P98 中国政治経済の最新事情『中国新体制の課題』 関 志雄
- P95 <Book Club> 『中国の二つの罟』 立道 肇
- P94 日本中華總商會沿革・主な活動



# 发言

## 首语

日本中华总商会发展

## 宏观与微观并举 理想与信念常在

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99年9月9日，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日子被认为是“苦劳”之日，但总商会也在坎坷中走过了14个年头。支撑总商会走过这么多年的，正是我们的信念——中日是互相需要、互为伙伴的重要关系，正因为这样在日华商才有了存在的价值。这个信念是我们坚信的观点、努力方向、奋斗目标。没有信念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总商会就是这样抱着信念做事，把促进中日交流与个体发展、企业发展相结合。

每个人或者企业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或企业的成长、发展以及各种需要的满足都离不开同外界交往与合作。合作可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合作可以扬长避短，集思广益，优势互补；合作可以互惠互利，共享成果。因此，中日间的合作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中日关系出现了问题，今后中日间依然会出现各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才更凸显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也正是有各种问题，才需要我们来发挥积极作用。

回望过去，总商会坚持“商”、“中华”、“日本”这三个定位，有力提升了总商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日华人代表性社团。但从我们做的事来看，主要侧重于宏观，也可称之为“务虚”，就是树旗帜、打品牌。比如说，我们每年都赴中国各地访问，与东南亚各地侨商团体建立关系。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在过去我们至少通过这样的活动打出了一个品牌，开辟了一个平台，通过这方面的工作，总商会成为了在日华人华侨的代表性团体之一。

下一步是如何具体利用这个平台做贡献，这是总商会未来的工作方向。

第一，结合上面讲的三个定位，首先要“在商言商”。比如中日商务交流，正在从宏观走向微观。只谈宏观的人往往忽视了这些微观的需求，或者是意识不到，但是真正做企业的人，他们的需求是很迫切的。从会员企业发展来说，宏观要做，微观也要做。

第二，要“以商养商”。在不否定以前工作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商”的作用，充分发挥总商会的潜在优势。就总商会这个团体而言，以前主要侧重宏观工作，没有具体实业，所以要靠会员提供赞助、会员做义工来运营商会。我想，今后商会发展要提倡“以商养商”。比如说，与地方政府、经济团体建立具体的合作关系，定向交流，点对点开展工作等，这些都是微观的体现。从这些工作中，总商会既会有新的收入源，又可以激发会员企业与中国地方的互动发展。

第三，充分发挥平台作用。虽然中日关系不平坦，但两国在经济领域的联系紧密，日本多数企业仍表示重视中国这一市场及生产基地，许多中国企业也急切希望引进日本技术。面临中日关系的低谷，如何利用好总商会这个平台，成为在我们思考的问题。

总商会平台虽然搭建起来，这个平台与中国互动不足，以前总商会工作侧重于日本国内，今后我们要加强互动。去年12月，我们在中国国内的第一家联谊机构——日本中华总商会北京联谊会正式成立。今年6月我们在日本成立的关西分会。接下来我们还要在中国成立上海联谊会、珠三角联谊会；在日本成立中部分会、九州分会。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从宏观上可以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做些具体工作，也可以从微观上把中日商务往来做得更加深入。

比如说在促进中日关系发展方面，总商会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从宏观上说，我们可通过各种渠道，多建议、多建言，在促进两国政府机构、经济团体的交流发展上有所作为；从微观上讲，我们可以发挥“商”的作用，充分发挥商会的潜在优势，促成中日企业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依然是绕不开的主题。总商会工作从宏观上讲，能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做贡献，同时也增加会员荣誉感；从微观上讲，务实工作能够促进总商会的组织发展，同时也能为会员提供更多机会。

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 严浩

2013年8月

## 总商会 2012—2013 年度活动纪要

2012 年

- 02.26** 事務局迁址东京有乐町电气大厦。
- 03.16** 在东京会馆召开 2012 年会员大会及交流会。
- 04.02** 日本中华总商会实现法人化，建立新的理事会、干事会体制。
- 04.06** 吉林省延吉市政府代表团来访商会。
- 04.19** 总商会与 NPO 法人 ISL 共同组织“日本战略型经营干部中国研修团”赴江苏省考察。
- 04.24** 大连市民营企业商会代表团来访。
- 05.18** 徐志敏副会长率团赴湖南参加第七届中国中部投资博览会。
- 06.30** 第四届 CCCJ 杯高尔夫大会在会员保有高尔夫球场举行。
- 07.15** 总商会与在日中资企业协会举办首届“友谊杯”高尔夫交流赛。
- 07.25** 在东京银座“上海小南国”饭店举办会员例会、交流会。
- 07.29** 总商会选派会员子女 13 人参加国侨办举办的“海外青少年夏令营”。
- 08.12** 总商会夏季访问团赴福建省和北京市考察访问。
- 08.24** 北京市金融管理局代表团来访商会。
- 08.30** 协办江苏省常州市东京经贸推介会，并与代表团进行交流。
- 09.05** 与广东省珠海市访日经济代表团进行交流。
- 09.07** 协调其他团体共同举办“2012 东京中国文化节”，反响热烈。
- 09.14** 总商会主办“中日经济论坛”及“华商杯高尔夫大会”，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
- 09.15** 与苏州工业园区访日代表团交流。
- 10.24** 第 2 回例会 & 恳谈会。
- 11.02** 在茨城举行第 4 届中日友好杯高尔夫球赛。
- 12.19** 迎新会（本年度新会员欢迎会）

## 2013 年

- 01.17 总商会新春交流会在东京港区举行,总商会会长严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韩志强先后就中日关系作了发言。
- 01.18 严浩会长、陈熹副会长、徐志敏副会长赴泰国参加“世界华商大会顾问委员会成立大会”,严浩会长受聘为首届顾问委员会委员。此顾问委员会成员均为历届世界华商大会主办团体代表人。
- 03.15 一年一度的会员总会在东京银行协会大厦内的“东京银行俱乐部”召开。
- 03.25 作为总商会文化活动——“绘画鉴赏与红酒之夜”庆祝会在东京银座“丝路画廊”举行。
- 03.27 广东省佛山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拜会总商会。
- 05.22 在东京六本木 ARK HILLS 大厦举办举办定期讲座。多摩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商务研究所代表沈才彬作了题为“从经营学视点看中共的管理”的报告。
- 05.28 “第九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商会多名会员受邀参加。
- 06.27 日本中华总商会关西分会成立祝贺会在大阪太閤园饭店隆重举行,关西政界、经济界 130 多名嘉宾出席了大会。
- 06.28 第五届 CCCJ 杯高尔夫友谊赛在位于兵库县的太平洋俱乐部六甲球场举行。
- 07.01 由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日本中华总商会联合主办的“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产业暨现代服务业发展推介会”在东京会馆举行。
- 07.01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日本中华总商会签署合作协议,日本中华总商会将成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日本指定业务联络窗口。
- 07.03 严浩会长率团访问山东省青岛地区,先后访问青岛市企业家协会、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墨市政府等机构。还考察了会员在青岛周边经营的大都青岛科技有限公司、安丘源清田食品有限公司、青岛大手海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

# 2013 年会员总会

## 未来三年会员企业扩至 500 家

总商会 2012-2013 年度活动纪要



总会现场



恳亲交流会

2013年3月15日日本中华总商会在东京银行协会大厦召开一年一度的会员总会。会员听取了2012年度事业报告，通过了2013年度事业计划案。大提出将在未来三年使会员企业扩大至500家。

总商会副会长徐志敏首先就《2012年度事业报告》进行总结，回顾了总商会的工作历程，介绍了过去一年来总商面向会员开展的各项活动、与日本经济届的交流、与海外华商团体的交流活动、与友好团体共同举办的活动等。他指出，总商会自去年由任意团体转变成为一般社团法人后，组织构成、运营方法随之发生了转变。一年来，总商会进一步强化了总商会的组织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营体制，成立了理事会、干事会，并在北京成立了联谊会。

徐志敏还就《2013年度事业计划》做了报告，提出了总商会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报告指出，总商会将

进一步扎根日本，充分发挥与中国联系的“管道作用”，成为日本经济界及世界华人经济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团体。三年后，会员企业将扩大至500家。

报告对总商会未来一年的日常活动进行了部署：在宣传方面，总商会官网将开设会员介绍模块、事务局每月定期将向会员发送信息邮件、编辑发行会刊、编制总商会15周年纪念文集。在涉外交流方面，继续强化与中国各地政府的互动及合作，在总商会成立联络处；做好接待海外企业及团体的访日活动，并提供相关服务；强化与日本经济团体的交流，共同举办各类活动。在文化交流方面，举办两次文化交流活动，继续办好青少年夏令营活动；体育交流方面，每月举办一次高尔夫交流会，举办滑雪活动，举行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交流赛；总务管理方面，强化事务局体制，积极开展收益事业。

报告还对如何强化组织进行了安排：在会员扩大发展方面，计划在本年度吸收法人正会员25家、法人赞助会员15家、个人会员10人；在组织建设方面，计划在7月成立日本关西分会，8月成立上海联谊会，并积极为在珠三角、青岛、大连、福建等地成立联谊会做准备。

报告提到了未来一年的特别企划事业：一，与公益社团法人日本经济同友会共同举办讨论会。二，举办日中经济论坛&华商杯高尔夫大会。

总商会会长严浩在发言中表示，这些年来，总商会经历了各种历练和阶段性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去年总商会从任意团体晋升为社团法人，在获得主流社会承认的同时，也完成了社会身份和存在方式的华丽转身。关于今后发展，总商会要继续坚持信念，围绕着“商”、“中华”、“日本”这三个定位，从宏观走向微观。

(文 / 孙辉)

# 总商会新春交流会 政经界祝愿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由社团法人日本中华总商会主办的2013新春交流会1月16日在东京港区举行,总商会会长严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韩志强先后就中日关系做了发言。

严浩会长在致辞里用“雪后的蔬菜更好吃”来表达对中日关系的良好祝愿,他说:“前几日东京下了大雪,新闻报道全都是交通不便等片面新闻。其实下雪不见得都是坏事,农家认为,植物在低温下,会将淀粉分解为可溶性糖,增加细胞液浓度,提高抗冻性,下雪后的蔬菜会更好吃。在中国也有瑞雪兆之说。所以下雪还意味着好年景。相信2013年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个好年,对总商会来说也是好年。”

严浩还表示,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先生以夫妻关系比喻中日两国,我认为夫妇关系或许可以终结,但两国却无法搬家。其实在邻国之间,有些纷争是难免的,这需要双方对这些问题积极思考,多对话和交流。希望新的一年两国继续推动战略互惠关系,进行良好的沟通,强化信赖关系,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总商会的力量虽然有限,但还是组织各种形式的民间交流活动。去年9月以来,已经组织了6次交流活动,包括商务讲座、高尔夫大会、迎新会等,其中一年一度的“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会”连续举办了多届,影响渐广,今年参加者人数超过往年,吸引了近150位在日华商、日本友人、高尔夫爱好者下场挥杆,这说明民间的友好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今后,总商会将继续为两国友好贡献微薄之力。

韩志强公使在致辞中对总商会的工作表示了肯定,他说:“日本中华总商会在中日间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团体,无论在两国经济活动中,还是在中日民间交往中,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韩志强还就世界经济形势和中日关系等问题发表演讲。他表示,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大的两个国家,中日经贸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到9月前,中日两国关系总体发展向好,贸易、投资、观光一片欣欣向荣。特别是中日两国邦交恢复40周年纪念活动,两国各界人士非常踊跃,年初计划开

展各类友好交流活动约200项,到8月超过600项,从中可以看到两国各界和民众对友好交往的巨大热情。令人遗憾的是,到了9月,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地采取“购岛”行为,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两国关系跌入低谷,经贸往来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于两国关系,韩志强公使表示,现在中日关系,有着非常大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关系是不可能分割的。从现在的局势来看,未来虽然还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两国关系一定会得到改善,并将继续发展,这个大趋势不会变。

此次交流会前,还举行了商务讲座,邀请日中产官学交流机构特别研究员田中修主讲。整场讲座以“2013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展望”为主题,从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八大后经济政策基本格局、金融形势如何变化等方面作了精彩的阐释,使在座中日经济界人士拓宽了思路,开阔了眼界,深受启发。(文/孙辉)

# 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北京联谊会



北京联谊会名誉会长杨小平致词



总商会副会长徐志敏致词

日本中华总商会变更为社团法人后,进一步强化组织体系建设。2012年12月3日,在中国国内的第一家联谊机构——日本中华总商会北京联谊会正式成立。总商会长严浩一行十余人与四十多位联谊会成员在北京出席成立大会,中国国务院侨办及北京侨办领导也到会祝贺。

联谊会推选杨小平(正大集团副总裁、正大置地总裁)任名誉会长、满

志伟(大塚制药研发董事长)任会长、陈晓光(中国教育出版社传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原后乐寮中方代表)任副会长、崔保国(清华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任副会长、周金诚(科瑞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任秘书长、许平(益新国际副总裁)任副秘书长。

总商会长严浩表示,今年是商会成为社团法人的第一年,恰逢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40周年。在我商会今

年年初制定的事业计划中,就把设立国内联谊机构作为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计划和筹备,我们终于在北京成立日本中华总商会在国内的第一家联谊机构。

严浩会长还表示,目前中日关系遇到困难,这对所有希望中日友好的人士来说,都是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对于始终致力于促进中日经济交流为主旨的日本中华总商会来说,非常希望通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日民间层次经济交流,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日本中华总商会在中国设立联谊机构,主要是面对赴日留学后在北京创业的企业家、日资企业驻北京的华侨华人高管,以及曾留学日本的家学者等熟知中日两国的精英人士,为他们的交流提供平台。希望通过会员的交流互动,共享商务信息,促成会员间的商务合作,达到推进中日两国民间经济交流的目的。





## 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关西分会

2013年6月27日，日本中华总商会关西分会成立祝贺会在大阪太阁园饭店隆重举行，关西政界、经济界130多名嘉宾出席了大会。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代理馆长·副总领事于淑媛、日本经济产业省近畿经济产业局长小林利典、大阪府商工劳动部长笠原哲、大阪商工会议所中国商务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桑山信雄等嘉宾分别致辞。

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严浩首先对关西地区的各界来宾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总商会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严浩还表示，关西地区是日本第二大经济圈，在对华经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总商会转变为社团法人时，就把设立关西分会作为重点工作。经过方方面面的计划和筹备，关西分会在大阪成立，“总商会”这个称号终于实至名归。今后希望关西分会能和总会一道，为促进中日友好和中日经贸关系发挥作用。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代理馆长·副总领事于淑媛对关西分会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期望中华总商会今后继

续发扬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传统，为华侨华人企业扎根当地提供协助；通过与日本当地社会良性互动，为提升中国人形象做出积极努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同日本关西地区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搭建桥梁。

日本经济产业省近畿经济产业局长小林利典在致辞中说：“近畿经济产业局是经济产业省的下属机构，承担着宏观经济职能，负责制订产业政策并从事行业管理。而总商会则是做微观经济，促进日中两国经济发展终究还是靠你们来实现。”

大阪府商工劳动部长笠原哲宣读了大阪府知事松井一郎的贺信。松井高度评价了日本中华总商会为日本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期待以成立关西分会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关西地区企业与中国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日本中华总商会关西分会首任会长刘炳义在致辞中表示，早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前，日本关西财界就派出经贸代表团访华，关西地区各界人士为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和经贸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来到关西，并在关西学习、创业、结婚、生子，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可以说已经融入关西。目前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对于我们在关西生活的华人来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把加强中日间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为己任。

大阪商工会议所中国商务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桑山信雄表示，关西与中国的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往历史悠久，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1971年，关西财界代表团就曾访问中国。去年恰逢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关西财界代表团第七回访问中国，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进行交流。现在，关西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早已渗透到各个领域，但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正是因为日中关系处在困难时期，才更需要民间交流发挥作用。

日本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徐志敏致闭幕辞中回忆了2007年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关西召开的盛况，对关西各界的支持再次表示感谢。

# 发现新机遇 总商会下闽上京

由社团法人日本中华总商会严浩会长率领、理事和会员20余人组成的访问祖国代表团，2012年8月12日至16日，先后到福建、北京访问考察，拜会了当地政府及其侨务部门，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还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 福州：希望华商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



福州市副市长陈晔等领导接见代表团一行

8月13日下午，福州市副市长陈晔、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国华、市侨办主任游晓东等领导接见代表团一行。陈晔副市长对客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代表团在福州多走走、多看看，进一步加深对福州的了解，继续支持福州的建设和发展。

陈晔介绍，福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福州马尾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州还是国务院首批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是祖国大陆离台湾省最近的省会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陈晔说：“福州在这几年发展很快，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金融、电

子、软件、现代服务、电子商务等行业都正在起步，是非常需求的，也希望日本华商及华侨华人能在福州找到好的合作项目，抓住发展机遇。”

## 平潭：欢迎日本侨商投资兴业



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领导座谈

8月14日上午，总商会一行先后考察了福建平潭综合经济实验区，并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陈东荣、经济发展局副局长严小华等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区管委会副主任陈东荣详细介绍了平潭开放开发情况，并希望日本中华总商会为加强日本与平潭的合作交流发挥更多的作用，欢迎更多的日本侨商来平潭投资兴业。

严浩说，日本中华商会总会每年都会组织访问团回国考察，这次到平潭收获很大，希望访问团能够在平潭寻找到商机，日本中华总商会能在平潭与台湾的交流中起到独特作用，把日本的服务理念和品牌引进平潭。

考察期间，访问团一行还实地查看了坛西大道综合管沟施工现场和规划馆。

14日下午，总商会一行前往福清市，参观侨乡风景，体验侨乡人文，并

与福清市副市长吴晓凡、侨办主任黄少文、侨办副主任林万兴进行会谈。

福清市副市长吴晓凡介绍，今日福清，各行各业都受益于侨，城市发展都与侨胞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严浩会长介绍说：“福建籍会员对总商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陈熹副会长就是福清人，在福建有两家食品工厂。常务干事王远耀出国前也在福清工作，如今在中日IT服务行业中已是佼佼者。从他们身上我看出福清人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精神。”

## 北京：希望华人企业参与北京建设

8月16日，北京市侨办李印泽主任、严卫群副主任、高云超副主任会见日本中华总商会严浩会长和访问团一行。

李印泽主任对严浩会长率日本中华总商会访问团到访北京表示欢迎，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往来和交流，积极引导日本华人企业参与北京城市建设，推动日本企业与北京企业的合作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严浩会长对北京市侨办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日本华人华侨现状及日本中华总商会相关情况，表示要充分发挥日本中华总商会的纽带作用，促进日本与中国、特别是与北京市的经济文化交流。

(文/孙辉)



与北京侨办领导合影

# 穿行福建 感受侨乡魅力

## ——2012 之夏总商会访问祖国侧记

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1260多万海外侨胞和480多万归侨侨眷是福建发展的宝贵资源,海外闽商更是在世界华商500强中占据了十分之一的比例。从8月13日起,一辆大客车载著日本中华总商会访问团一行穿行于八闽大地。三天奔波,所见所闻,印象最深的是,在福建,华侨的作用无处不在。

### 在家是条虫,出门就是龙

8月13日,从在从福州市区前往福建平潭综合经济实验区的路上,遍布一栋栋欧式风格造型精美的洋楼。在这三天里,从福州市区到最东边的平潭岛,从平潭到福清市再到福州长乐机场加起来上百公里的路途,这些占地相仿,造型各异的小洋楼不断呈现在车窗外。

这样的别墅在福清并不罕见。一栋栋五六层高的别墅洋楼长在田间地头,一栋比一栋气派豪华。通往村子的水泥路空荡荡,偶尔见到三三两两步履蹒跚的老人,间或放学的小孩们蹦蹦跳跳。这些孩子的乡村童年生活是孤独的,他们的父母大都在国外打工。

若问谁家有人在国外打工,只需看一样东西:房子。不出家门打工谋生

是无论如何建造不起这一栋栋造价过百万元的豪宅的。

福清市侨办领导在座谈时告诉我们,仅福清这个总人口120万的县级市,如今在日本打工经商的不下10万人。整个福清24个街镇,去年从海外汇入的款项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日本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东宇株式会社董事长陈熹是福清人,他告诉我们,正如福建的简称“闽”,在家是条虫,出门就是龙。远涉重洋打工经商,乃当地数百年的悠久光荣传统。

日本中华总商会常务理事、中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远耀也出身福清,他说,因多沙地,这里无法种植水稻,这里只适合种地瓜和花生,虽然靠海边但不适合出海打渔,海边的人也只是在退潮时拾一些贝类或小鱼小虾。

穷则思变,与其饿死不如一搏,第一批赴海外打工的人背起行囊,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下东瀛。

王远耀1983年到高山供销社工作,这个地方就位于龙高半岛,在出国的风潮下他于1987年来到日本留学。

陈熹出国前已在福建省经济委员会食品办公室工作,有着令人羡慕的金饭碗。1987年,在朋友的介绍下,陈熹辞去工作来到日本留学。“左邻右居



感触武夷山魅力

家都有在海外的人,我家也有亲戚旅居海外,所以就想出去看看。”陈熹坦言,是侨乡的风习让他放弃了安逸的机关工作。

### 热潮席卷平潭

8月14日,踏上平潭,热浪袭来。迎面而来的“热浪”,除了酷暑的高温,更多的是开放开发的热潮席卷这个中国的第五大岛,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岛县。

日本中华总商会的大客车驶上目前平潭唯一的陆上对外通道海峡大桥,正加紧建设的平潭海峡大桥复桥工程映入眼帘。平潭海峡大桥2010年11月通车,让39万平潭人告别了完全依靠轮渡进出岛屿的历史,而平潭海峡大桥复桥当年9月开建。

2010年起,平潭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明确3年投入1000亿元人民币,创造令人惊奇的“平潭速度”。而构建两岸海上快捷通道,是平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两岸对接的重中之重。(文/孙辉)



当地媒体采访访问团一行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由中文导报社主办、日本中华总商会共办的“第四届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会”，于2012年11月2日在茨城县霞浦市的PGM球场“Segovia Club”顺利开杆。自2009年以来，旨在推动中日经营者交流、加深民间友好的“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会”已经连续举办多届，影响渐广。今年的第四届大会，是继前三届之后的又一次友好盛会，吸引了近150位在日华商、日本友人、高尔夫爱好者下场挥杆，共襄盛举。

第四届大会获得各方响应，吸引了中日各界企业人士积极参与，也得到了企业界热心协赞。朝日新闻社、中国银行东京支店、华为技术日本株式会社、加贺Sports株式会社、Laox株式会社、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东京华侨总会、株式会社大仓饭店、藤田观光株式会社、东京香格里拉酒店、三明物产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大都商会、MHD MOET HENNESSY DIAGEO株式会社、日进木工株式会社、株式会社 Authentic Interna-

tional 等多家中日企业提供赞助，保证了第四届大会成功举办。

11月2日，天气晴好，参赛者情绪高涨。早晨7点，参赛人员准时汇聚球场，精神饱满地等待开赛。本次大会由中华总商会的孔怡主持，总商会的黄俊利说明了当天的比赛规则。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EPS集团会长严浩和中华总商会副会长、Loax社长罗怡文代表主办方致辞。他们感谢大家参加第四届球赛、支持这场有意义的民间交流活动，希望大家通过高尔夫比赛能进一步增进感情和理解，促进商务往来，同时也享受挥杆的快乐。随后，全体出场人员合影留念，留下了美好的纪念。

第四届大会的前六名分别为：第6名是三明物产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陈建军、第5名是IST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近森精志、第4名是在日华人王健忠、第3名是日本友人植木俊宏、第2名准优胜者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株式会社JCD代表取缔役社长徐志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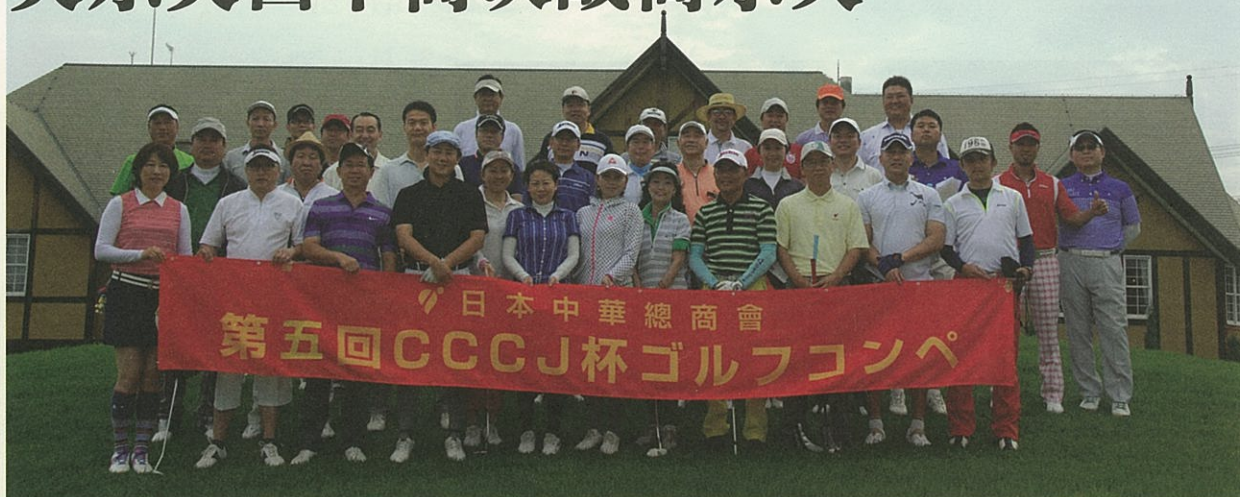
当天，按最低杆数计算的“最佳净杆 Best Gross 奖”，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驻日本首席代表刘勇夺得，日本职业高尔夫选手大町昭毅为他颁发了奖杯和奖品。

第四届大会令人翘首以盼的冠军优胜大奖，最终由李ENTERPRISES株式会社社长李秉光荣获。日本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徐志敏、株式会社大都商会会长邓明辉共同为他颁奖。冠军得主除了捧得金灿灿的奖杯以外，同时获得由大都商会提供的32寸液晶电视机一台、日产化学工业提供的“日产灵芝”精装礼盒、加贺Sports株式会社提供的高级球杆、日进木工提供的精致家庭用具、(株)MEDICAL LINE提供的红酒等，收获不菲。

第四届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会顺利落下帷幕，与会者切磋了技艺，增进了了解，建立了友谊。众多参赛者纷纷庆贺大会成功，希望明年继续举办，让“中日友好杯”的品牌发扬光大。

(文 / 杨文凯)

# CCCJ杯 关东关西华商决战高尔夫



严浩会长为冠军颁奖



冠军岩崎友亮接过奖品。

作为日本中华总商会关西分会成立庆祝活动，第五届CCCJ杯高尔夫友谊赛2013年6月28日在位于兵库县的太平洋俱乐部六甲球场举行，关东关西两地的36名高尔夫爱好者一显身手。

当日风轻云淡，参赛选手的出色演绎使得本次大赛亮点无数，精彩纷呈！经过约五个多小时紧张激烈的鏖战，赛事终于尘埃落定，岩崎友亮、尚捷、冈岛刚分别夺得了冠亚季军。

CCCJ是日本中华总商会的英文缩写，2009年以来CCCJ杯高尔夫友谊赛每年举办一届，赛事以“沟通交流，健康发展”为宗旨，旨在为广大会员提供一个轻松休闲，互动交流平台。过去四届CCCJ杯均在关东地区举办。



关西分会刘炳义会长欢迎致词。



关西分会副会长马云国希望扩大交流。



## 关志雄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1957年出生于香港，197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课程毕业，其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任职，2004年4月起就任现职。著书《共存共荣的中日经济》、《中国经济革命最终章》、《推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中国第一》及《中国 两个陷阱》等多部。

# 不断升级的中国贸易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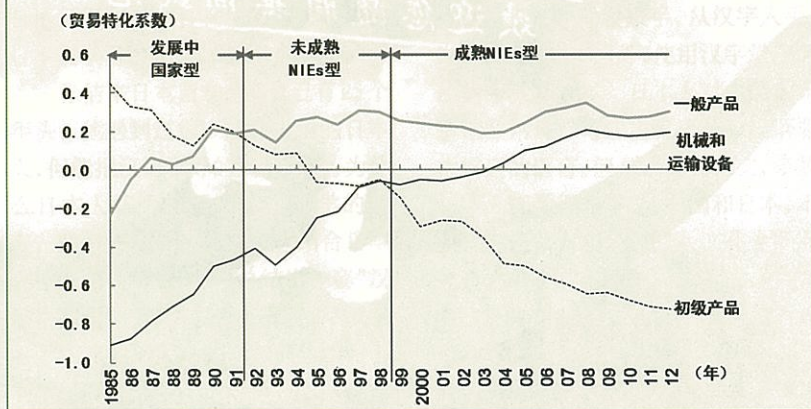
## ——与各国的互补、竞争关系随之变化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正在从新兴工业国阶段向发达工业国阶段靠近。因此，中国与新兴工业国的竞争性减弱的同时，与部分发达工业国的互补性也逐渐减少。中日之间的贸易结构也正从互补型向竞争型转变。

中国由于近年来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和实际汇率上升，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出口疲软，生产开始向海外转移。对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正在出现产业空心化。不过，这种看法视野狭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在中国，低附加值产业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较高附加值产业获得了发展。正如下述贸易结构的变化所示，中国的产业正在稳步升级。

在以日本为首的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口的主力从初级产品向工业产品过渡，从工业产品中的劳动密

图1 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状况



(注) 贸易结构的各个阶段

	贸易特化系数
发展中国家型	初级产品 > 一般产品 > 机械和运输设备
未成熟 NIEs 型	一般产品 > 初级产品 > 机械和运输设备
成熟 NIEs 型	一般产品 > 机械和运输设备 > 初级产品
发达工业国型	机械和运输设备 > 一般产品 > 初级产品

贸易特化系数 = (出口 - 进口) / (出口 + 进口)

(资料来源) 根据 ADB, Key Indicators 2003 和 CEIC 数据库的数据制作。

集型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这种模式可以通过追踪主要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出口与进口之差除以出口与进口之和,数值越大表示国际竞争力越强)的变化来确认(参见图1)。具体来说,根据初级产品(SITC分类的0-4部)、一般产品(SITC分类的5、6、8、9部,指除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外的工业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分类的7部)各自的贸易特化系数的相对大小,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分为发展中国家型、未成熟NIEs(新兴工业国)型、成熟NIEs型、发达工业国型四个阶段。按照这种分类,中国的贸易结构正在从成熟NIEs型向发达工业国型转变。

受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中国与各国的竞争、互补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显示两国间贸易结构相似性的“贸易相关指数”(Trade Correlation Index)的变化得到确认。该指数的数值在+1和-1之间,数值越大(靠近+1),两国的贸易结构就越相似,竞争性也越高(互补性越低);反之数值越小(靠近-1),两国的贸易结构就越不同,竞争性也越低(互补性越高)。

一般来说,中国与发达工业国及资源大国的竞争性较低(互补性较高),相反与新兴工业国的竞争性较高(互补性较低)(参见图2)。然而近年来,发生了下述应予以关注的变化。

首先,正如图3显示,中国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工业国的竞争性正在下降。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较快,出口逐渐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集中。今后,以劳动密集型为中心的产业从中国向其他新兴工业国的生产转移将会进一步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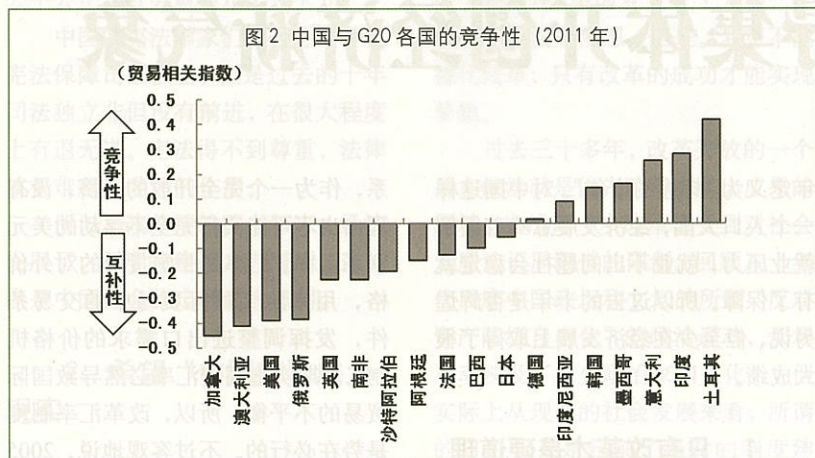
其次,中国与澳大利亚、俄罗斯等资源大国的贸易相关指数的负值幅度正在扩大。中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与这些国家的互补性正在增强。

再者,中国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工业国的贸易相关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中国的优势从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械和运输设备等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转变,所以加大了与这些国家的竞争。

具体来看,中国与日本的贸易相关指数从1995年的-0.31上升趋至2011年的-0.05。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展,而且也反映了日本产业升级的停滞。日本和中国的竞争虽在加剧,但是跟其与德国、韩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发达工业国相比依旧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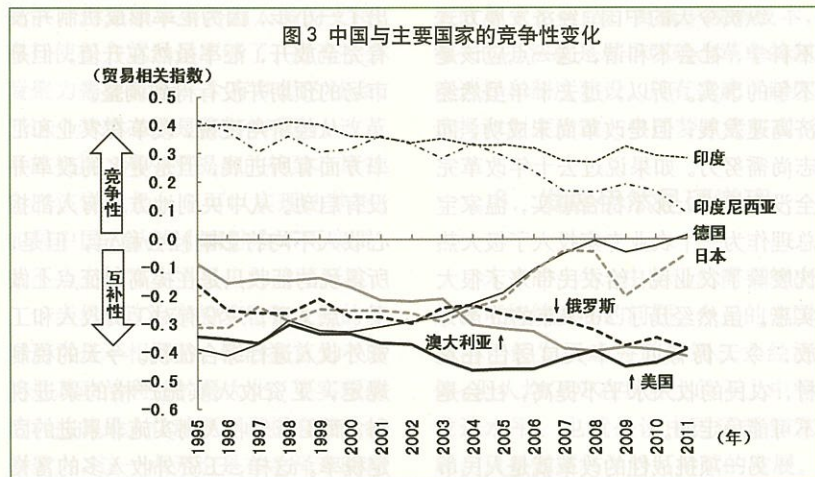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工业产品出口的激增是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甚至是经济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只要认识到中国以往的优势都集中在基本不与日本发生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不难看出这种主张并不成立。然而,今后日本在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传统优势领域与中国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如何应对中国产业的进一步升级,才是日本真正的挑战。

图2 中国与G20各国的竞争性(2011年)



(资料来源) 根据 UNCTAD 数据制作

图3 中国与主要国家的竞争性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UNCTAD 数据制作



## 柯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1963年 生于中国南京市  
 1988年 旅日留学、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  
 1992年 毕业与爱知大学、入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1994年 获得经济学硕士(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入长银综合研究所(国际调查部研究员)  
 1998年 入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2007年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2011年 兼任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广岛经济大学特别客座教授  
 著作:《中国的不良债券问题》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年)等

# 中国新领导集体开创经济新气象

历时十年的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政府完成了历史使命,将权力稳定移交给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班子。过去十年,政府一直在鼓吹“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可是十年过去,望眼中国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劣就可以断定经济发展仍然是非科学的,同时,群体事件频频发生也说明中国社会尚未达到和谐。

新一代领导班子履新以后提出了要实现“中国梦”。什么是中国梦?其实就是要过幸福一点的生活。具体的说,就是不担心衣食住行,不担心老后没有人照顾,不担心看不起病,不担心孩子上不起学,等等改善生活的基本面。但是对于一个拥有13亿4000万人口的大国,要解决一小部分人的衣食住行尚可,但要解决大部分人的吃饭、看病、孩子上学等问题就不容易了。

回顾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约10%,中共十八大把过去十

年定义为“辉煌的十年”。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意味着缓解就业压力,就业不出问题社会稳定就有了保障。所以过去的十年是否辉煌另说,但至少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绩。

### 1. 只有改革才是硬道理

纵贯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社会不和谐,这一点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过去十年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改革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如果说过去十年改革完全没有推进,那不符合事实,温家宝总理作为一个农业专家投入了极大热忱废除了农业税,给农民带来了很大实惠。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仍有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提高,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

另一项挑战性的改革就是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长期以来与美元联

系,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实行完全不浮动的美元联系汇率。汇率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用来定义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条件,发挥调整进出口需求的价格机制。长期实施固定汇率必然导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所以,改革汇率制度是势在必行的。不过客观地说,2005年7月实行的汇率改革应该说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因为汇率形成机制并没有完全放开,汇率虽然在升值,但是市场的预期并没有得到调整。

从经济角度说,改革在农业和汇率方面有所进展,但是更多的改革并没有启动。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担心收入不均将影响社会稳定,但是,所得税的征收只是在提高起征点上做了一点文章,并没有对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进行综合征税。今天的税制规定,工资收入实施严格的累进税制,而工资外收入则实施非累进的固定税率。这样,工资外收入多的富裕阶层的税负就很低,而工薪阶层就成



了主要的税负对象。最为严重的是，至今税制改革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其结果是资产急速地积累到特权阶层，社会公平被遏制，这样不可能实现社会均富。

另外，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否定要政治改革，但是，政治改革一直是只打雷不下雨。民主选举仍然停留在乡村一级干部选举的试点阶段。如此改革速度，中国要实现民主公正至少需要一百年。我们注意到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否定民主的普世价值，只是明确表态中国不会实施西方式的民主。中国不能照搬外国的制度是英明的决定，但不照搬西方的制度不等于说就可以不改革，过去的十年政治改革几乎在原地踏步，政治体制不实现公平公正，社会就很难公平公正。

中国的宪法学家们一直呼吁尊重宪法保障司法独立，但是过去的十年司法独立非但没有前进，在很大程度上有退无进。宪法得不到尊重，法律就很难起到准绳的作用。

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了，制度的建设大大滞后，这一点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障碍。

## 2. 希望“中国梦”成为现实

作为政治家可以行使权力使人民畏惧，但是如果得到人民的支持，靠行使权力就远远不够了。提高社会凝聚力需要营造一个有梦想的社会，但这个梦想必须是能够实现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构建小康社会应该说就是一个可以实现梦想。如果中国人认为小康社会不可实现，就不会支持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

当然，政治家的梦想和人民的梦想通常是不相同的。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其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要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就要尽量提高政治的凝聚力，这一点无论是在毛泽东时期还是在邓小平时期，亦或现在的中国

都一样。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提高政治的凝聚力靠的是意识形态和对其个人的崇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趋多元化，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微小，同时，对政治家个人的崇拜也早已形同虚设，人民变得从来未有的实际。谁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他们就相信谁，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普遍大众心态。

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实现了转型。这三十年中，中国基本上消灭了无产阶级，共产党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三个代表证明了一点，就是共产党已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制度改革必须基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新一代领导人接替政权伊始就提出了要实现“中国梦”。一个人和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梦想。但是，梦想不能替代改革，只有改革的成功才能实现梦想。

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做法就是优先改革容易出成果领域。当然每一步改革都受到对社会发展认识局限性的限制。回顾八十年代风靡中国政坛和文坛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那场运动殃及了多少政治家和文人，但实际上从现在的社会发展来看，所谓的自由化只是超前了当时的制度建设，而自由化本身并没有问题。所以，要改革少走弯路，要减少改革成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早明确改革中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建设。只有完成了制度选择和制度建设，中国梦才能实现。

## 3. 发展仍然是硬道理

未来的十年，中国仍然需要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在世界上算不上中等发达水平。也就是说中国还需要发展，只是需要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济发展成了很多官员升官的工具，这一点与其说是这些官员的问题不如说是制度的问题，因为，官员的政绩通常是有上级根据经济发展来评定的。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其首长往往得到重任和嘉奖。作为官员的任命体制很难想象任用和嘉奖发展落后的地区的官员。久而久之，各地区就展开了经济发展的竞争，这一点应该说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升官不惜弄虚作假夸大实际的经济增长。

从这一点上说，中国要实现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就需要重新选择和构建政治及经济制度。比如对官员的业绩的评定不应该仅仅自上而下，更重要的应该是自下而上。人民的公仆应该经历起人民的检验。

另外，发展的成果不应该被少数特权集团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由全国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不能要求回到完全公有制的体制框架下，但至少应该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

在明确了政治体制民主化趋势的基础上，新一代领导应该注重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应该说市场经济改革刚刚形成了雏形，实质性的改革尚未启动。首先，市场机制尚未完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汇率没有完全自由浮动，在国有经济垄断的体制下，价格机制很难实现看不见的调节作用。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要推动金融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民营化，加强对企业和银行的治理，治理企业和银行的不是政府，政府是监管部门，治理者应该是股东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对企业的治理。

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在南方巡视时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今天，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不仅要发展，同时要让所有的人民能够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是中国梦。



## 朱炎 拓殖大学政经学部教授

1957年生于上海。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82—86年在上海市财政局工作。86年赴日留学，入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90年—96年服务于富士综合研究所。96年转至富士通总研，任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2009年转任拓殖大学政经学部教授。

# 后钓鱼岛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

2012年9月发生的日本政府购岛事件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购岛事件引发领土问题的对立为转折，中日关系有可能会进入互不妥协，互不合作的时代。中日关系大幅度倒退，经济关系也出现很大的变数。购岛事件对中日经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后，即后钓鱼岛时代，中日经济关系如何发展等问题备受关注。

## 1. 购岛事件对中日经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购岛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对立加剧，两国之间的国民感情急剧恶化。也影响到了经济领域。

中国的消费者为表达对日本的不满，不愿意购买日本产品，出现了自发抵制日货的行动。由此造成日本的对华出口即中国从日本进口大幅减少，一些行业和部分企业损失惨重。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从日本进口自2012年8月开始出现负增长，事

件发生后降幅扩大，今年1—5月仍未摆脱同比减少的状态（图1）。当然这也有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主要还是受中日关系恶化的冲击。相比之下，中国对日出口的降幅相对较小。主要可归因于日本市场对中国产智能手机的需求量很大。

受影响最大的是汽车行业。日本的主要汽车厂商都在中国生产销售，在中国销售的日本品牌汽车每年已达300万辆。对日本汽车厂商来说，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日本汽车的最重要的市场。但是，从去年9月开始，日系汽车的销售直线下跌，今年1月后略有回升，但至今未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事件前，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有20%的份额，10月跌倒7.6%，今年5月才回升到16%（图2）。

还有一个受影响较大的方面是观光。日本将吸引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作为振兴经济的一大举措，而且中国游客增长最快，在日本的消费也最多。但是，事件发生后，中国游客出游绕开日

本的倾向较为明显，日本旅游业遭受巨大打击。据日本政府观光厅的资料，从去年9月开始，中国人入境日本的人数大量减少，其中游客人数锐减。今年春节后，赴日旅游略有回升，但尚未恢复到事件前四分之一的水平。

另外，日本企业在中国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参与政府项目及并购的审批被推迟，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都出现了不利于经济关系发展的认识和言论。比如，在日本，舆论过分渲染中国的“反日”情绪，呼吁日本企业从中国撤退。同时，渲染中国商品、中国食品不安全，号召消费者不买中国货。而在中国，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不再依赖于日本企业的投资，不太担心中日关系紧张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那么，事件对中日经济关系的负面影响今后是否继续，前景真的那么悲观吗？下面将分析后钓鱼岛时代，即中日关系紧张对立长期化情况下的

中日经济关系的走向。

## 2、日本企业继续对中国投资，布局中国市场

不少人担心日本企业是否会继续在中国投资，是否会从中国撤资？对此，笔者并不悲观。

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从80年代开始，经历了90年代中期和2000年代中期的井喷式的增长，近年来仍在稳步增长。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1年底，在中国登记注册的日资企业的数量已达22,790家。

日本企业之所以对华投资，从日本国内看，是成本上升、日元升值、国内市场萎缩等因素的推动。从中国看，是受庞大的人口和众多的低价劳动力、经济高速发展市场扩大、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等因素的吸引。投资是出于经济目的，带来了双赢的结果。

以制造业为例，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及在华经营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出口型，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产业配套能力，低成本生产，产品出口或返销日本。此类企业注重的是劳动力等生产成本及汇率的变化，而且进入中国时期较早。另一种则是内销型，在中国生产中国销售。此类企业注重的是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及收入水平，还有销售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期相对较晚。也有不少企业是两种类型兼有。

不同类型的日企追求不同，对中国经济的变化以及中日关系紧张的反应及所受影响各不相同。先看看出口型日企的动向。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工资上涨，人工费等成本上升较快，劳动力供求趋紧，人民币逐渐升值等不利因素增加。政策方面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的优惠和支持逐渐减少。在中国生产，产品出口及返销日本的好处大大减少，不少日资企业面临招工困难，利润减少的困境。企业自然要趋利避害，因此，寻找更为有利的

生产基地就是很自然的选择。近来有一些日本企业将部分产品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甚至日本国内。有不少人将此行为解释成因受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日本企业开始撤离中国。

对此，应该有正确的认识。第一，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本来就有追逐低工资、低成本的特点，不可能停留一地永续经营。第二，转移出去的只是部分产品或工序的生产加工，企业并未关闭撤离，而是转型。过去，日本企业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也兴办了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现在，生产早已转移出去了，但企业还在继续经营，而从事销售、售后服务、采购、研发等业务。第三，劳动密集型的日资出口企业在“反日”过程中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只是在转移的时期上有所重合。换言之，即使中日关系不出现紧张的情况，这些企业早晚都会转移。第四，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不是仅考虑工资成本，还要考虑产业配套，通关物流，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比较的话，东南亚的低工资国家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政府效率与中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即使生产转移，也不可能全都离开中国，有一部分会转往中国内地。

再看看内销型企业。尽管因中日关系紧张，生产和销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有一时的迷茫观望，但多数日资企业并未放慢发展的脚步。对多数日本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是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也是决定企业今后生存发展的战略性市场。而且，日本企业已在中国经营多年，再加上文化、地理等因素，日本企业在中国有一定的优势。在购岛事件后，中日关系紧张，消费者不购日货的时期，内销型企业基本上没有撤退，而是等待时机好转，同时为对应将来的发展追加投资，布局未来。因为日本企业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不可替代的大市场。事实上，今年以来，在汽车、钢铁和化工等原材料行业，还有零售等服务业，日本企业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

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2012年9—12月，来自日本的外商投资金额达2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3%，而同期中国吸收外资的总额则下降了4.3%。今年1—5月，日本的投资为34.1亿美元，同比增长5.8%，同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只增长了1%。日本投资所占比重从之前的5%上升到7%，排名则从第三上升至第二。从日本对华投资的按月累计额看，无论是去年9—12月还是今年1—5月，都高于上年同期的水平（图3）。

从中国方面看，产业的升级换代，推进节能环保都要不断地积极引进日本的技术和企业的投资。

由此可见，中日关系恶化虽然给日本对华投资及日企在华经营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日本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市场，还会在中国继续扩大投资。部分日企转移生产，短期来看不利于中国国内的就业，但从长期来看有助于中国优化产业结构。

## 3、体现相互依存的贸易结构

在贸易方面，中日双方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互补双赢的。可从贸易统计来分析结构性的双赢关系。

2012年，日本从中国进口中，除了食品（占5.3%）和服装等日用品（17.8%）等最终消费品外，其它都是面向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一部分的制成品。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机电电子（26.3%）和一般机械（16.5%）。同样，日本向中国出口也主要是机电电子（占23.7%）和一般机械（20.7%），以及汽车和零部件（9.6%）。

中日之间进出口结构重叠部分很大，说明双方在同一领域互通有无，是产业内分工甚至是企业内分工的贸易结构。

实际上，日本制造业的各行各业都已通过直接投资在中国设厂生产，将一部分产品、零部件或生产工序转

移到中国生产加工。也就是说,产业链已经延伸到了中国,日本企业与在中国的日企之间,或与中国企业之间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关系。中日之间的企业相互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甚至制成品构成了中日贸易的大部分。而且,日本企业供应中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就技术水平而言,现阶段尚无法替代的东西居多。即使是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最终消费品,其开发、生产、流通等环节都有日本参与其中。

中日贸易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外交关系、景气变动的影响,但只要这种产业分工,配套合作关系继续存在,中国经济及日本经济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就不会一蹶不振,而是会继续发展扩大。换言之,只要企业(不管是日本企业还是中国企业,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持续经营发展,就需要采购和销售,那么中日贸易就不会断流,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中日贸易就会发展。

#### 4、中日经济关系还将继续发展

中日关系因领土问题而对立紧张,目前还看不到缓解的迹象。在政治、外交关系没有改善之前,双方缺乏互信,也没有推动双边关系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关系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是,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并不完全依赖于政治。

中日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产业分工的经济关系,能有利于双方的发展,互利共赢。只要日本企业继续在中国经营,只要产业分工关系继续,产业链有交集,那么以投资和贸易为主体的经济关系就将继续前进。

而且,中日双方都不希望政治对立影响到经济。实际上,即使在严重对立互不相让的情况下,金融方面的合作和自贸区谈判也没有停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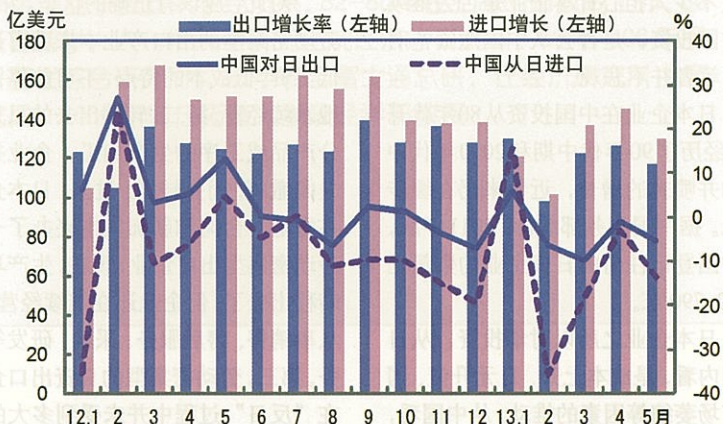
当然在缺乏互信,缺乏动力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推动政府间的新的合

作项目,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但既有的投资、贸易关系反而会备受关注和爱护。至少今后不会比现在更糟。

在这样的时期,要维护中日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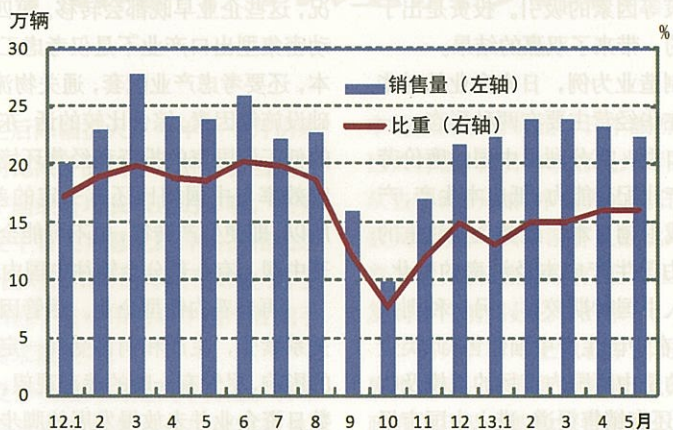
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在日华人,特别是华人企业家的作用更加重要。在两国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消除误解,促进合作,华人企业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1 中国对日进出口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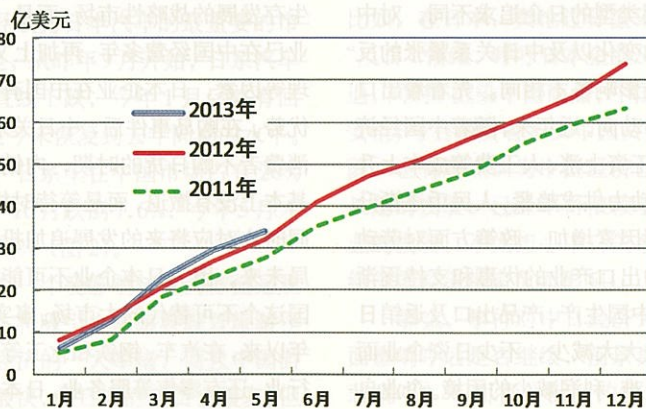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图2 日系乘用车的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图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按月累计额)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 中国新体制の課題

## 「中所得の罍」と「体制移行の罍」を克服できるか



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シニアフェロー  
関 志雄

(かん しゅう)  
経済学博士(東京大学)  
1957年香港生まれ。  
1986年東京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  
HSBC本社経済調査部エコノミスト、野村総合研究所経済調査部アジア調査室室長、  
経済産業研究所上席研究員などを経て現職。

### 待ち受ける「二つの罍」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に開催された中国共産党第十八回全国代表大会(党大会)を経て、習近平は胡錦濤の後任として総書記となり、政治局の常務委員の人事も大幅に刷新された。それに続いて、二〇一三年三月に開催された第十二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人大)第一回会議では、国家主席 胡錦濤から習近平へ、や國務院首相(温家宝から李克強へ)をはじめとする政府のトップも交替された。新体制の下で中国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に、内外の注目が集まっている。

振り返ってみると、胡錦濤前体制下の十年間において、中国では、国内総生産(GDP)で見た経済規模こそ

大きくなったものの、多くの構造問題はむしろ深刻化の一途を辿った。これを背景に、成長率は低下しており、社会も不安定化している。これらの現象を理解するために、世界銀行と清華大学の研究グループがそれぞれ「中所得の罍」と「体制移行の罍」という概念を提示している。前者は「経済発展」、後者は「体制移行」の過程で待ち受ける問題に焦点を当てている(図)。

### 世界銀行が提唱する「中所得の罍」論

「中所得の罍」は、世界銀行が提示した概念である(三 and Kharas, 2007; World Bank, 2012)。ある国が、一人当たり所得が世界の中レベルに達した後、発展戦略及び発展パターンを転換できなかつたために、新た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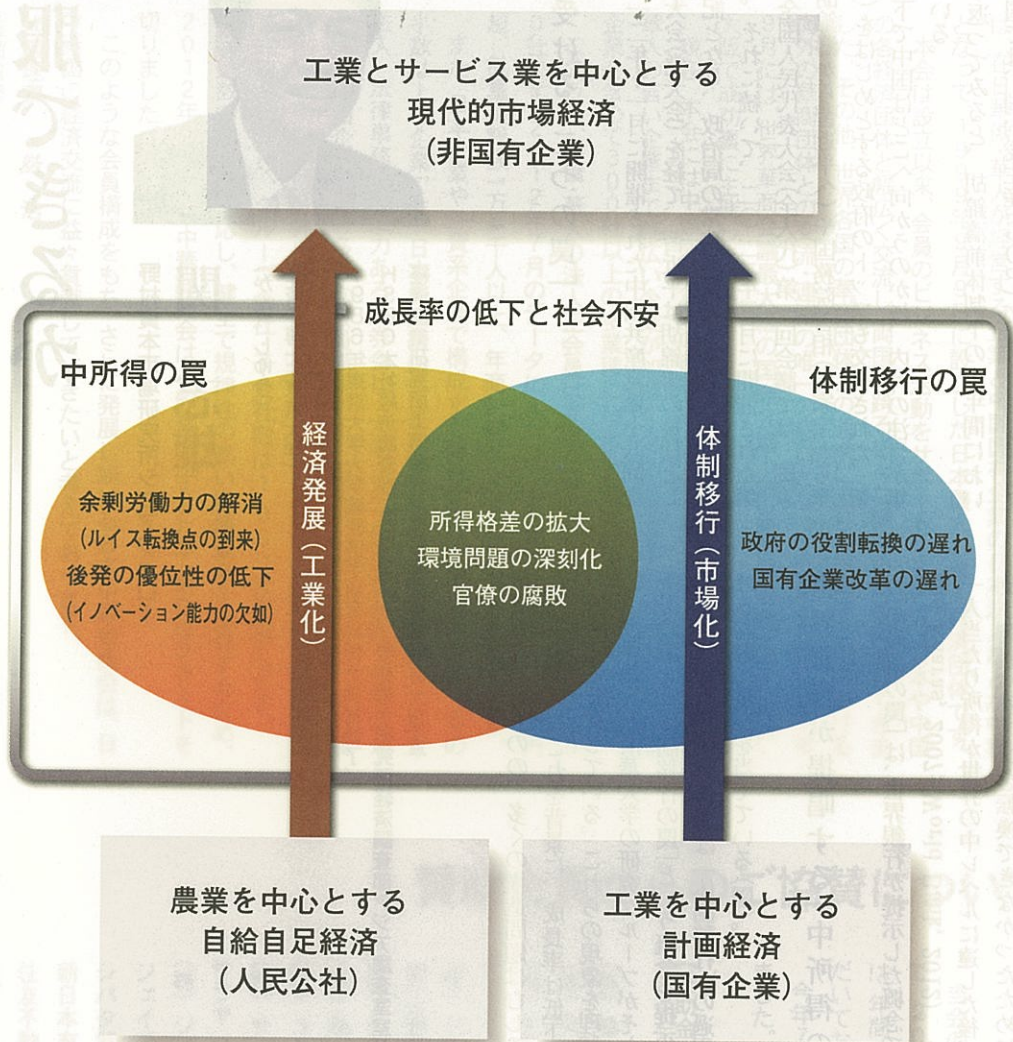
成長の原動力を見つけないことができず、経済が長期にわたって低迷することを指す。「中所得の罍」に陥った国々に共通した特徴として、余剰労働力の解消、産業高度化の停滞、貧富格差の拡大、環境の悪化、官僚の腐敗といった、それまで蓄積された成長制約要因が一気に顕在化し、成長率の低下とともに社会が不安定化することが挙げられる。

一般的に、低所得国は、労働力を生産性の低い農業から生産性の高い製造業に移すことを通じて、労働集約型製品の輸出を伸ばすだけでなく、国全体の生産性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もできるが、中所得国になると、農村地域の余剰労働力が急速に減少する。特に発展の過程における完全雇用の達成を意味するルイス転換点を過ぎると、労働力の供給が成長の制約となり、また、賃金上昇によって労働集約型輸出製品の国際競争力も低下してしまう。その時、自国のイノベーション能力の向上を通じて生産性を高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経済成長は停滞してしまうのである。

中南米諸国は「中所得の罍」に陥った国の典型例である。これらの国々は一九六〇年代から七〇年代の間、低所得国から中所得国に進んだが、その後長期停滞が続いている。一九六〇年時点で一〇一もあつた中所得国・地域のうち、二〇〇八年までの間に高所得国に発展したのは、赤道ギニア、ギリシア、香港、台湾、アイルランド、イスラエル、日本、モリリシヤス、ポルトガル、プエルトリコ、シンガポール、韓国、スペインという十三カ国・地域のみである(World Bank, 2012)。

中国は、三十年余りにわたる改革開放を経て、総じて国民生活が改善され、国際社会における存在感も増している。しかし、ここに来て、成長率は下がってきている。うえ、所得格差の拡大や、環境問題の深刻化、官僚の腐敗などに対する国民の不満が高まっている。二〇一二年九月中旬に中国各地で起きた反日デモが暴動に発展した

図：経済発展と体制移行の過程で待ち受ける「二つの罅」



出典：関志雄著「中国 二つの罅」（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2013年）

ことに象徴されるように、社会が不安定化している。これらは、一部の研究者の間では「中所得の罅」の兆候としてとらえられている。

「中所得の罅」を克服するために、中国政府は、「経済発展パターン」の転換」と「調和のとれた社会」を目指し

ている。「経済発展パターン」の転換は、「需要構造の面における投資と輸出から消費へ」、「産業構造の面における工業からサービス業へ」、「生産様式の面における投入の量的拡大から生産性の上昇へ」という二つの転換からなる。そのねらいは、経済の量的拡大とともに、質の

向上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ある。また、「調和のとれた社会」を実現するために、「都市」と「農村」、「東部」と「西部」、「富裕層」と「貧困層」の間の格差を縮小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に向けて、戸籍制度などによる農民への差別をなくし、また腐敗の蔓延を止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清華大学研究グループが提唱する「体制移行の罅」論

経済発展の過程に伴う問題に焦点を当てた「中所得の罅論」に対して、清華大学研究グループ（二〇一〇）は、計画経済から市場経済への移行過程に伴う問題に焦点を当て、「体制移行の罅」という概念を提起している。ここでいう「体制移行の罅」とは、計画経済から市場経済への移行過程で作り出された国有企業などの既得権益集団が、より一層の変革を阻止し、移行期の「混合型体制」をそのまま定着させようとする結果、経済社会の発展が歪められ、格差の拡大や環境破壊といった問題が深刻化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

ロシアや東欧の国々が採った急進的な「ビッグバン・アプローチ」とは対照的に、中国が「石を探りながら河を渡る」といわれる「漸進的改革」を進めてきたことも、既得権益集団の形成に有利な環境を与えている。

「清華大学研究グループ」によると、「体制移行の罅」に陥った中国経済は、次の五つの「病状」を示している。

まず、経済発展が歪められている。既得権益集団は短期間に利益を上げるために、資源の大量な浪費も辞さずに、高成長を追求している。また、自分の利益を損なう体制改革を避け、もっぱら経済成長を通じて矛盾を和らげようとする。民营企业が苦境に追い込まれる中で、経済発展は政府主導の下で進めざるを得なくなる。大規模な建設プロジェクトの推進や、大型イベントの開催が成長を促進する重要な手段になっている。

第二に、体制改革は停滞し、移行期の体制がそのまま定着してしまっている。既得権益集団は、旧体制と新体制の要素を上手く組み合わせて、自分の利益を最大化しようとしており、国有企業による市場独占はその典型である。政治をはじめ、重要な分野において、改革が先伸ばしされている。既得権益集団は、自分に不利な改革に反対する一方で自分に有利な改革だけは積極的に進め、その結果、大衆の改革に対する希望も支持も失われてきている。

第三に、社会的流動性が低く、社会構造は固定化されつつある。まず、社会における階級間に断層がでてしまっている。社会全体の活力が衰えている。また、階級間の対立が顕著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さらに、社会から疎外された一部の人が絶望に追い込まれている。これらを背景に、社会の矛盾が激化している。

第四に、「社会の安定維持」が国を挙げての最重要課題となっている。そのために、多くの資源が投入され、またその大義名分下で、改革が先伸ばしされている。また、社会の安定維持のための対策は、本来の意図に反して、かえって社会を不安定化させる要因になっている。最後に、社会崩壊の兆しが日増しに顕著になっている。特に、一部の地方政府による権力の濫用が目立っている。権力が十分に制約されていない中で、土地の立ち退きを巡るトラブルが頻発するなど、農民・市民と政府の対立が激化しており、社会の公平と正義の維持が困難になってきている。

こうした認識を踏まえて、同グループは、中国が「体制移行の罅」から抜け出すための方策として、次のような提案をしている。

まず、市場経済、民主政治、法治社会といった普遍的価値を基礎とする世界文明の主流に乗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なぜならば、世界文明の主流を拒絶することは、中国が「体制移行の罅」に陥った主因であると同時に、現

在の利益構造を維持する口実になっていくからである。また、政治体制改革を加速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権力の腐敗は、政府の権威と政策実行能力を弱めている。政治体制改革は、政府の透明性の向上など、権力を制約するメカニズムの形成から始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さらに、改革に関する意思決定を、これまでのように各地方政府や各政府部門に委ねるのではなく、中央政府の上層部によるグラント・デザイン(中国語で「頂層設計」)の下で進めるように改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改革を推進するに当たり、国民の支持を得るため、彼らの意見に耳を傾けると同時に、公平と正義を基本価値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新体制の最優先課題に

中国はすでに「中所得の罅」と「体制移行の罅」からなる「二つの罅」の兆候を示しており、これを乗り越えていくことは、習近平総書記を中心とする新体制にとって、最優先課題である。そのために、経済改革に限らず、政治の分野を含む改革の深化が必要である。

経済改革に関しては、第十二次五カ年計画(二〇一一年―二〇一五年)や、第十八回党大会における胡錦濤報告において、具体的ロードマップとタイムテーブルを含む上層部によるグラント・デザイン作成の必要性が強調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新体制の主導でまとめられる新しい経済改革案の全貌は、二〇一三年の秋に開催される予定の中国共産党第十八期中央委員会第三回全体会議において明らかになるだろう。

一方、習近平総書記は、就任以来、「権力を制度という籠に閉じ込める」(習近平、二〇一三a)「中国共産党は、鋭い批判を受け入れるべきだ」(習近平、二〇一三b)と述べるなど、政治改革についても積極的姿勢を見せているが、既得権益集団の抵抗が予想される。これに対し

て、今年三月の全人代で新たに選出された李克強首相は、「既得」利益に触れることは、往々にして、魂に触れることよりも困難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を示したうえで、「改革は国家の命運と民族の前途に関わっている」だけに全力で推進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決意を表明している(李克強、二〇一三)。

しかし、現在の指導部には、改革に消極的である「保守派」がまだ強い勢力を保っており、習近平総書記と李克強首相が本気で改革に取り組みにしても、まず、政権の二期目の五年間において、国民の支持を集めるなどを通じて自分の権力基盤を固め、二〇一七年の第十九回党大会を経て、より多くの「改革派」が指導部入りを果たす二期目まで待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ろう。

### 参考文献

- ・習近平(二〇一三a)第18期中央規律検査委員会第二回全体会議での重要講話、一月二十二日。
- ・習近平(二〇一三b)習近平総書記が主催する、各民主党派中央と全国工商業聯合会の新旧幹部、無党派代表などを中南海に招き、新春を祝う会での発言、二月六日。
- ・清華大学研究グループ(二〇一三)「中所得国の罅」それとも「体制移行の罅」(清華大学・凱風発展研究院社会進歩研究所と同大学社会科学系社会発展研究グループの共同研究)「開放時代」第三期。
- ・李克強(二〇一三)第十二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回会議終了後の記者会見での発言、二月十七日。
- ・Gill, Indermit and Homi Kharas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2)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中国國務院發展研究センターとの共同研究), World Bank.

# 论语与算盘之辩



涩泽荣一

## ■ 杨文凯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经历了割肉抵当、破产卖地的社会痛苦，然后一狠心开始引进美式资本主义的利益优先和成果主义，结果出现了无条件信奉“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手”的堀江贵文这样的市场新贵，其代价是社会弱势群体扩大，中小企业受到挤压，地方经济惨遭抛弃。过去几年来，日本社会经常提起明治产业之父涩泽荣一，每每援引涩泽的“经济道德合一说”来批判日益不和谐的社会现实，形成一股风尚。

在日本金融和产业的中心地带，在东京站和日本桥之间的常盘桥边，在百年老店日本银行的正对面，涩泽荣一的青铜塑像巍然屹立。这尊塑像自战后重建迄今，时时刻刻注视着日

本经济的兴衰消涨和社会的阴晴晦明。明治时代的产业之父虽看尽时代风云而面不改色，可在天之灵不免充满了愁怅。

涩泽荣一（1840—1931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与福泽谕吉、岩崎弥太郎并称“明治三雄”。福泽倡“脱亚入欧”，奠定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基础；涩泽著《论语与算盘》，奠定日本近代化的产业伦理；岩崎创三菱财阀，奠定日本近代化的产业基础。事实上，涩泽本人也是屈指可数的大产业家。他一生创建企业500余家，建立公共事业600余项，主持建立了日本近代的银行、工商、教育等各种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被尊为明治产业之父。涩泽在《论语》的“义利之辩”基础上创立了日式产业伦理，形成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行为准则。所谓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原点，可以追溯到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享年91岁高寿，一生纵贯明治、大正的日本资本主义发生期和创制期，并与中国晚清的民族工商业巨头南通张謇惺惺相惜。作家幸田露伴写下了历史上第一部《涩泽荣一传》，指出涩泽荣一是真正的时代之子。涩泽出身半农半商之家，很早就从筑波党的失败中了解到国家发展经济、积蓄实力的重要性。明治时代的社会名流大都由武士变身，热衷政治变革和军事强国，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作为基础性支持力量的经济的作用。涩泽荣一是真正看清财力、物力重要性的少数人——有一个历史比喻形像地说明了问题：韩信、彭越、英布等人都是箭，张良是弦，萧何才是弓。

1867年，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世博会，历访欧洲；1869年，他入仕明治政府大藏省；1873年以后，涩泽由官转民，担任了第一国立银行总监役，参与创立商法讲习所（现一桥大学），出任东京府养育院事务长，设立银行团体择善会，出任东京商法会议所会头等。

涩泽一生奉公（public），不重私利，他改变了家族经营的传统主流，建立起以社会公募资本为主的企业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打开了由股份制推动的日本企业的兴盛发展之路。涩泽荣一创设的企业有第一国立银行、东京海上保险会社、王子制纸、东日本旅客铁道、京阪电气铁道、东京煤气、清水建设、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帝国饭店、札幌啤酒、东洋纺织、大阪纺织、共同运输等，超过500社，至今都是各种产业领域里的领军企业和中坚企业。涩泽荣一完全可以把众多企业统合起来形成“涩泽财阀”，就如岩崎弥太郎构筑“三菱财阀”一样，但涩泽志不在此。对应于明治时代的“和魂洋才”，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概念，这可能是有关“儒商”的最早表述。涩泽希望建立一个能培养出大批经营群的社会，并使经营者们自觉认识到企业不是谋取私利的舞台，个人履行经营权是接受社会委托的重任。

涩泽荣一不是单纯的数字发展论者，而是成熟的制度经济论者，更是弥补经济与理论这一对“二律背反”的卓越的身体力行者。涩泽荣一写出名作《论语与算盘》一书，指出了为了安定追求作为社会主题的“利”，必须



建立起秩序化的社会组织架构和伦理规范,即“义”。涩泽提倡“利是义之和”,“拨算盘讲利,读论语取义”,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是义利合一。经营者需要超越私利私益的观念,在为国家和社会奉献诚意的基础上取得利益,才是真正“无垢的利益”。涩泽荣一在100年前就超越了私利私益,他自任为现代产业经济的助产婆,为日本的发展贡献了才智和心力。

当前的时代正向着重利轻义方向急转,企业及经营者为了巧取利益而盲视社会伦理法规,轻视弱势群体蔚然成风。在流弊丛生之际,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并获得深刻再认识,意义不浅。北尾吉孝是软库金融(Soft Bank Marketing)的经营责任者,也是

2005年堀江贵文收购富士电视台大股东日本放送危机中,最后出手为富士电视台纾困解难的那位强人。北尾在中国演讲时表示非常尊敬涩泽荣一,他认为信、义、仁这些植根于儒教的思想应该是经营判断的标准。北尾解释说:“信,就是绝对不违约;义,就是要有个正当的行为;仁,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多考虑对方。”北尾还以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来印证涩泽荣一的“经济道德合一说”:要发展资本主义,关键有精神支柱,要老实、勤奋、节约。他表示,人创造的社会、组织、公司,这种人的伦理价值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发展,中国的老话叫“穷理”,经营企业也应该追求真理。作为堀江的前辈,互联网时代资本市场

的弄潮儿,北尾引用涩泽理论,给正打着灯笼满世界寻找“诚信”和“道德”的中国人上课,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和谐社会如何才能建成呢?百年前的涩泽荣一给出答案,那就是在市场和社會之间建立和谐的平衡关系。《论语与算盘》提出的“义利观”不是彼此对立否定,而是互相依托调和:纯由道德掩盖市场,结果会招来经济上的自灭困境;而放纵市场统治社会,则不免导致贪戾成性,见利忘义的劣质循环。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社会发展,其差别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涩泽荣一身体力行的儒家资本主义的传统,或许不是万能灵丹,但依然值得尝试。

## 近江商人与三方好合



伊藤忠兵卫

■ 杨文凯

6月初,日本主办了第五届非洲开发东京国际会议。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非洲各国首脑会谈时,闻听客人提及“有很多国家都到非洲去投资,但能为我们带来职场伦理的国家,只有日本”。安倍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对日本式“瑞穗资本主义”的积极评价。其实,日本式经营伦理,早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发轫了,给后世带来深刻影响的当推近江商人推崇的“三方好合”原则。

现代企业不仅要创造财富和价值,更要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就是CSR。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的泡沫年代,现代企业的社会贡献意识应运而生。1990年,日本企业进入以捐款捐物为代表的“社会贡献元年”;1995年,以阪神大地震为契机,日本企业开启了以志愿者奉献为代表的“NPO元年”;2003年,以更加专业而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为标志,日本企业转进“CSR元年”。事实上,日本企业导入社会贡献的理念和实践历史悠久,CSR可以看成是日本企业血液

中既存的DNA。在前现代甚至更早的时代，日本的经营者们可能不了解CSR概念，但对于“三方好合”原则大都耳熟能详。可以说，正是近江商人的“三方好合”奠定了日本式经营伦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安倍所谓“瑞穗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江户时代，从现在滋贺县地域的近江国里走出的商户长年行商于大阪和江户之间，逐渐形成商业势力，被称为“近江商人”集团。他们崇尚的座右铭是“三方好合”，即做买卖要做到“卖家满意”、“买家满意”、“世间满意”——换用现代语言来解读，即意味着要考虑并照顾到利益相关者全员的利益和幸福。企业如果破产了，会给企业的从业员、股东，当然还有交易对象、顾客、地域各方面造成各种麻烦。尽量避免这种事态发生，是企业经营者的责任。所以，近江商人经营企业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永续发展，而不是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种想法，视之为江户时代版的CSR(企业社会责任)毫不为过。近代以来，由近江商人发展而来的伊藤忠商事、丸红、东丽、高岛屋、武田药品工业、日本生命等众多百年老铺支撑起日本经济，享誉世界，其经营伦理的源头就是“三方好合”精神。

伊藤忠商事，是拥有近江系商人血脉的著名企业，其创始人第一代伊藤忠兵卫以近江商人的经营哲学“三方好合”精神奠定了事业基础，迄今也成为伊藤忠商事展开CSR事业、以世界性企业的立场去理解多元价值观、努力不辜负社会期望、切实维护“被社会所需要企业”地位的精神源头。

伊藤忠商事创业可以追溯到安政

5年(1858)，第一代经营者伊藤忠兵卫踏上了从滋贺县丰乡村出发到长崎的麻布批发之旅。伊藤忠兵卫把出生地近江的商人经营哲学“三方好合”精神作为发展事业的根基，除了让买卖双方满意之外，还有幕藩时代允许近江商人为当地经济做贡献的“对社会有利”活动。用第一代忠兵卫的话来表述，就是“买卖是菩萨之业，买卖之道，贵在对买卖双方都有利，满足社会需求，合乎佛祖之意”。

第一代忠兵卫在明治5年(1872)制定了《店规》，采用会议制度，实行了相当于如今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方针、人事制度、就业规则的内部规定，这成为伊藤忠经营理念的根本。根据“三方好合”原则，伊藤忠兵卫不断引进“利益三分主义”，即使在封建色彩还很浓厚的时代，他已经把净利润按照总店利润、本店准备金、店员分红三部分进行分配。第一代忠兵卫与店员分享利润的做法是非常前卫的，这构筑了店主和员工之间相互信赖的基础，成为现代CSR的先导。

2008年，伊藤忠商事迎来了创业150年。在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伊藤忠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形势剧烈波动等时代风暴，但仍然顽强地成长壮大起来。靠纤维贸易起步的伊藤忠商事，根据时代的要求改变并扩大了商社事业，经营商品的种类和范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影响已经扩大到从上游到下游、从原料到零售的各个方面，企业的性质也逐步发展转换为综合商社，进而成长为国际综合企业。伊藤忠商事在过去150年里继承并实施的“三方好合”精神，在时代和社会的不断变化中得到坚持，也让企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尽

管，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由忠兵卫时代的“为员工负责”扩展到了“全球供应链管理”、“人权的主流化”、“符合时代要求的劳工标准”、“吸引多元化人才”、“履行环保节能责任”、“与所在地区共存共荣”等多种领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让社会满意”越来越从“三方好合”精神中凸显出来，也对现代企业形成考验。

经营企业究竟为何？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理解，直接折射出经营理念的境界高下，也影响到企业存续的时间长短。企业经营的目的，或可递进式描述为：首先为解决经营者个人脱困之道，其次为满足经营者欲望之用，其三为满足股东们投资回报，其四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务，其五为了员工及其家人获得幸福生活，其六为社会进步带来创新发明和经营业绩，其七为改善社会环境履行责任做出贡献。

历史已经证明，经营目的之高尚与企业存续之长短成正比。在日本，创业超过100年的长寿企业为世界之最。根据东京商工会议所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末，在日本创业100年以上的企业有2万1666家，创业超过200年的企业也有3146家。200年以上的长寿企业，德国837家、法国196家，在欧洲不算少，但在数量上还是日本占压倒性多数，据说全世界“200年企业”有40%以上都是日本企业。在风险企业速成也速朽的当今世界，以“三方好合”为基本理念的日本企业不管是令人憧憬的永续经营企业的活体标本。显然，只有站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制高点，才能树立企业健康发展的长远目标，才能赢得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欢迎加盟  
日本中华总商会  
日本中华总商会